

思想周刊

观点

新论

思想者

文史

铭记英烈精神 锻造坚挺脊梁

■ 宋佩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仍然需要英雄情怀。上海是一座英雄辈出的城市。辛亥革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在上海生活、斗争、献身的英烈有1700余位。这些人当中,既有普通工人、党的干部,也有革命领袖。他们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努力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是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红色文化根脉所在。

绘就初心图谱

关于英雄,有着丰富的界定和内涵。有爱国情怀,以身许国、精忠报国的是英雄;有英雄气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是英雄;有时代担当,心中有责、无私奉献的是英雄;有奋斗精神,爱岗敬业、不懈进取的是英雄。就上海的情况而言,其特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级别高。上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而且曾经是党中央的所在地,城市白区工作的前哨阵地。著名的五卅运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于此。因此,在上海牺牲的烈士特别多,龙华烈士陵园也就成为革命先驱和领导者牺牲安葬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其中,既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也有省一级的革命干部。

据统计,纪念馆眼下陈列展示的革命先烈中,曾任中共中央委员的有17人,分别是蔡和森、瞿秋白、罗亦农、苏兆征、杨殷、罗登贤、张太雷以及李汉俊、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彭湃、林育南、顾作霖。

第二,类型广。上海是一座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积极支援全国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对城市发展和国家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绘就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图谱。

第三,人数多。龙华烈士陵园包括235名陈列在龙华烈士纪念馆中的烈士,近600名骨灰安放在纪念馆中的烈士,近800名遗骸安葬在墓地中的烈士,270余名集体安葬在无名烈士墓中的烈士,近100名有诗文作品的烈士。

其中,有民主革命时期的抗英爱国将领陈化成、“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和中共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张太雷、蔡和森、瞿秋白等,还有“陈氏革命两兄弟”、“军委四烈士”、龙华“二十四烈士”、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邓演达、卓越的科学文化战士邹韬奋、国民党爱国将领谢晋元、用生命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李白,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牺牲的烈士吕世才、盛铃发,等等。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英雄叙事,革命英烈的光荣传统是国家软实力的基石。走近这些英雄,重温他们的故事,可以清晰感受到“祖国至上、无私奉献、锐意创新”的英烈精神,是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和城市财富。

“祖国至上”重点体现在革命先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作出的牺牲。龙华“二十四烈士”中,出身于南洋爱国华侨家庭的欧阳立安仅仅17岁,左联五位作家平均年龄26岁。他们都是风华正茂的共产党员、爱国志士,在民族危亡之际敢于坚守信念、慨然赴死,践行了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无私奉献”体现在以科学家为代表的各个群体为祖国建设甘愿作出的牺牲上。为了保家卫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上海儿女积极奔赴前线、奔向边陲,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中华大地上。其中,具有高尚品德和爱国情怀的钱学森、为科学事业无私奉献的科学家彭加木是卓越代表。

“锐意创新”体现在改革开放时期各条战线涌现出的开拓创新人物身上。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如邹碧华、汤庆福等,以鞠躬尽瘁、锐意创新的精神,为城市发展和国家富强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值得敬仰的时代坐标。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祖国至上”的信念、“无私奉献”的品格、“锐意创新”的精神,锻造出中国人坚挺的脊梁。就龙华英烈精神而言,它既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是在各个历史阶段由无数仁人志士共同创造的,是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和不竭的精神源泉。

缅怀英烈,需要反躬自省;缅怀英烈,更要展望未来。今天,我们正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时代,对以龙华英烈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可以清晰地昭示世人——我们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忽视实践脱离实际,难免言必称希腊

■ 黄力之

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来说,更加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

拒绝“盲人骑瞎马”

实践优先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首见于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中,有三条直接表述了实践优先的观点:

其一,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争论。

其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解决。

其三,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实践优先的思想,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基本关系系出发的,肯定了存在对于思维的优先地位以及思维必须符合存在的正确性标准,浓缩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髓。有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人们便可知晓如何获得正确的思想、如何评价思维成果的正确性、如何运用正确的思维成果去解决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在于确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了这个道理: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这种坚持并非字字句句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可以了,而是要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创新马克思主义本身。

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还要创新马克思主义?这正是马克思关于实践优先思想的逻辑结论,而不是出于主观愿望。追溯历史,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过程中,党内曾发生过“食洋不化”、教条主义的错误;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党的实

践出发,而是从本本上的论断或者别人的经验出发,违背了实践优先的原则。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期指出,当时在学校教育与干部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如此,一些人对中国问题无兴趣,一心向往的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真是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毛泽东同志批评的教条主义,其实质性的危害还不仅仅体现在理论教学上,更体现在革命的实践中。上世纪30年代,由于教条主义者迷信本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也不屑于深入实践,使得当时的一些理论、方针政策脱离实际,本身亦成为僵化的教条,失去活力和生命力,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险境。最终,在1933年至1934年间,给我们党和我们的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

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拨乱反正,重新在全党普及马克思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基本原则,纠正理论和实际分离的错误倾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充分体现自主性、独创性的伟大理论成果,才得以引导中国革命走上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直面中国问题实践中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解决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问题。历史证明,只有坚持实践优先这一马克思主义核心原理,才能产生自主性、独创性的伟大理论成果,在广义上说,它标志着20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飞跃进步,标志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实现了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不应该“自废武功”

当前,我们已经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一方面,中国在解决“站起来”问题的基础上,迎来了“富起来”和“强起来”的阶段。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人均收入也已迈入中上国家行列。

另一方面,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的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基础还有待夯实,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并非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愿而快速实现。

从国内来看,还存在收入分配差距、生态保护及教育、医疗、住房等众多复杂的民生问题,社会价值观念失范等问题也有待正视;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泛滥,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单边主义势力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依然存在。这说明,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都处于新的发生过程中,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矛盾不存在了,新的矛盾又不断产生。

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每时每刻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不能守着对过去中国实际的认识不动,不能守株待兔、刻舟求剑。只有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准确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才能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经艰难曲折而取得的伟大成果。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一大证明。这样一个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不是简单延续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它没有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充分自主创新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也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深入实际生活,研究各种矛盾以及矛盾的各个方面,找出解决办法,形成新的理论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一段时间里,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无论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还是历史学、文艺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视实践、脱离实际的现象。某些研究对象看上去是讨论中国问题,但研究的方法不是立足实践、面向现实的,而是以外国人的结论作为判断中国问题的出发点。这种现象,被统称为“言必称希腊”。

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由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构成的创新性结构。事实充分证明,它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奇迹。因此,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对于这个基本经济制度中发生的问题和弊端,我们当然应该去深入研究和解决,这本身就是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契机。可有的人总是认为这样一个结构不行,总是提出极端性的主张,或者要取消公有制经济,实现私有化,或者是否定、怀疑民营经济,希望民营经济离场。这些主张之所以错误,恰恰在于采用了错误的研究方法,要么是依据西方发展模式,要么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

回到马克思的正确思路,可以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为什么不把社会生活本质说成是“理论的”而说是“实践的”呢?其实,这与马克思的另一句话是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要改变世界必须先尊重世界、认识世界,而不是先尊重自己的主观意志。面对因两个“毫不动摇”而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现实,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与书本的差异或者与别人经验的差异而“自废武功”呢?

当然,实践的结果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带来了成功,另一方面产生新的问题。既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抛弃成功经验,当然是有难度的。但唯其如此,才恰恰需要创新。因此,我们必须牢牢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事求是地提出自主创新的理论观点。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当官为政之人如何慎独慎微

■ 陈方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要想行得端、走得正,就必须涵养道德操守,明礼诚信、怀德自重,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特别是要增强自制力,做到慎独慎微。在新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慎独慎微”也被列入考察要求之中。

慎独慎微既是涵养道德操守的重要方法,也是涵养道德操守的崇高境界。尤其是,当官为政之人手中握有权力,面对的诱惑比普通入多,也更有可能会成为别有用心者“围猎”的对象。因此,要保持清廉,更应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做到慎独慎微。

坚持底线思维

慎独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没人监督时面对诱惑,内心要保持一种戒慎恐惧的心态。这就是《礼记·中庸》上说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里的“不睹”、“不闻”之地又称为“暗室”,慎独首先要做到“不欺暗室”。

对于干部涵养道德情操来说,如果有严密的监督,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不犯错误应该说并不难。难的是在八小时之外和无人时坚守做人做事的底线,始终做到不放纵、不越矩、不逾矩。这就要求干部在面对诱惑时,一定要在内心给自己划好底线,并把底线视为带电的高压线、人生的鬼门关,严防死守,做到“知止而后有定”。

很多走上犯罪道路的干部不是不知道底线在哪里,也不是不知道底线不能碰,甚至在第一次踩上底线时也曾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内心也徘徊过、后悔过,但由于底线意识不强而不能做到对底线的坚守,导致底线一破再破而变得无线可守,最终一失足成千古恨。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形象地比喻为:“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

一开始就要扣好。”所以说,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绝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或者以“就这一次”为托词替自己开脱。要时刻警醒自己,侥幸的结果往往就是不幸,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确保表里如一

慎独的第二层含义是,在没人监督时不仅不犯错误,而且根本就不想犯错误,因此,既要做到“不欺暗室”,更要做到“不自欺”。

如果说“不欺暗室”是指不要欺负别人,强调修养的方法,那“不自欺”就是不要欺负自己的“天地良心”,强调修养的境界。为此,要做到表里如一,在没人监督时不仅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根本不想“越雷池一步”。

一般来说,干部的级别越高,自由裁量的权力就越大,直接监督的人就减少,而“围猎”的人则会越多。在权力“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时候,在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恶劣的地方,要做到表里如一更难。这就更需要洁身自好、勇于担当,不仅要有“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而且要有“两个维护”的行动自觉,不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和“高级黑”,不做两面人、搞两面派、搞“伪忠诚”。

注意小事小节

所谓慎微,就是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后汉书》上讲:“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针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识几。”事物的质变都是由量变引起的,既要防止坏的量变引发质变,又要推动好的量变引发质变。

一方面,要按照“八项规定”的要求对照检查自己,严防不知不觉变质、“温水煮青蛙”,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很多干部走上腐败道路都是从拿了别人一条烟、吃了别人一顿饭或者收了别人一幅画等小事小节失守开始的。万一刻令智昏或者小事小节不保,更要及时进行自我批评。这时,错误处于刚刚萌发阶段,改过迁善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需瞄准市场和需求

■ 熊亮



集成电路产业技术含量很高

面临的“卡脖子”问题严重。以集成电路产业为抓手实行攻坚突破,是上海打造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的重要内容。

第一,放大下游市场的不可替代性。在全球化背景下,集成电路产业链条上各个企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便在集成电路产业发源地的美国,龙头企业云集的同时也利用国外技术;作为光学和精密仪器生产线缔造者的日本和德国,也未能实现独霸全球;我国台湾地区的集成电路制造商,其扩张过程也需与全球企业特别是大陆企业展开合作。

对上海而言,要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集成电路产业创新高地,既需进一步扩大开放、强化合作,积极利用国际合作与资源整合实现自身发展,也需进一步放大产业链下游市场的不可替代性,让上游供应端在“卡脖子”问题上逐渐动摇甚至瓦解。

第二,延伸首届进博会效应。首届进博会专门设置集成电路专区,建议第二届进博会设立中国国际集成电路产业专业博览会。通过开放式论坛、集聚业界行家、高校专家、行业协会等,共同商讨集成电路技术的突破口和路线图,避免相关产业政策偏离市场、偏离需求。同时,还可设立“一带一路”国家集成电路展区,引导国内企业积极对接更广阔、更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第三,解决进出口企业的政策不适应问题。2018年8月1日,商检和海关的合署办公对芯片进出口企业适应新政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及时完善和优化配套政策,以解决进出口频繁的集成电路企业所面临的政策不适应问题。

第四,引导建立集成电路企业统一采购联盟,探索在产权交易所建立集成电路技术和产品交易专门平台。研究显示,尽管集成电路产业领域具有较高的核心产品垄断性,但海外技术厂商在发货上也有二级代理商,我们可加强龙头企业与集成电路技术和产品采购上的合作,提升贸易话语权。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决策参考》编辑部副主任)